

史学调查与探索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历史学学部论丛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编

201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SHIXUE DIAOCHA YU TANSUO

JIAOYUBU SHEHUI KEXUE WEIYUANHUI

LISHIXUE XUEBU LUNCONG

史学调查与探索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历史学学部论丛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编

201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
2016 /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7-303-21180-7

I. ①史… II. ①教… III. ①史学—调查研究—世界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48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SHIXUE DIAOCHA YU TANSUO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30.25

字 数：463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8.00 元

策划编辑：宋旭景

责任编辑：齐琳 王一夫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京鲁设计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马克垚	冯天瑜	李剑鸣	张岂之	林 沅	茅家琦
赵 毅	姜义华	桑 兵	钱乘旦	阎步克	葛剑雄	瞿林东

主 编

马克垚 瞿林东

编 辑

张 越



前 言

本刊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的学术咨询性质的年刊，2011年和2015年分别出版了第一辑和第二辑，今年出版的是第三辑。

本刊的宗旨是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针，贯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章程，在历史学学科领域范围内积极开展学术调研、咨询工作的基础上，提供相关信息交流的园地。本刊发表的文章，一是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报告，二是有关学术前沿重要问题的研究进展信息，三是有关学科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值得关注的倾向性的资讯，四是有关推进学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等。

本刊尤其关注关于学科建设、史学前沿、学术建议、学术调查等方面有实质性和启发性的文章。历史学部的所有成员，固然因职责的关系，有义务为本刊撰文。但是，本刊更广泛的作者当是辛勤耕耘在历史学各领域第一线的学者、专家，这是本刊真诚的期待。希望本刊有益于全国史学界同人，也希望全国史学界同人支持本刊。

本辑包含“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和“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两个主题，都是近年来在历史学学科发展中受到关注的前沿问题。中国史研究如果离开世界史的背景，会影响对中国史特色的阐述——因为特色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果离开中国史主



体，也很难真正理解研究世界史的意义和目的。“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意识，将会从历史研究的理论、视角、方法等方面带给中国史学新的思考。“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不仅涵盖了以全球化的多文明视野进行的中国史研究、外国史研究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还要求具备在认识论的层面去看待与分析“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2016年7月



目 录

· 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

一般与个别：略谈中外历史的会通	阎步克 / 1
文化的古今之辨与中外之辨	冯天瑜 / 14
区域历史的结构与再结构：历史研究的“会通”如何实现？（论纲）	赵世瑜 / 20
是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	原祖杰 / 26
关于“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问题	李工真 / 38
“自由”与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会通	方光华 / 44
重回中国历史本体	王学典 / 63
北宋治国中化解矛盾的怀柔方式及其倾向	陈 峰 / 73
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姚大力 / 88
美日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进程中的钓鱼岛问题考	崔修竹 崔 丕 / 125

· 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

东方主义的形成过程简介	马克垚 / 161
存在与影响：中国与世界	葛剑雄 / 173
多文明视角与文明本体	刘景华 / 186



多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论纲)	黄 洋 /190
中国文明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看(论纲)	王建新 /196
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论纲)	杨巨平 /210
汉唐西王母神话与华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知	张绪山 /215
全球历史观与明清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赵 毅 /239
关于中日战争的文化史思考	冯天瑜 /243
中华文明枢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姜义华 /259
汉文明在元时期：果真存在一个“低谷”吗？	姚大力 /267
近代文明视野下的江苏社会形态	马俊亚 /279
白云观与民国初年社会	付海晏 /304
近代早期英国“文明”概念考辨	张乃和 /336
近代以来日本的文明观变迁	杨栋梁 /357
史学发展：继承创新和批评商榷	瞿林东 /370
中国与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史与世界史	桑 兵 /375
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中西史学近代转型	胡逢祥 /380
本土经验与异域理论：20 世纪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冯筱才 /387
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孙卫国 /393
跨国史的兴起与 20 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王立新 /402
怎样回应文化的不可公度性问题	蒋重跃 /422
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刘家峰 /443
东亚的古老农具——耒	林 沄 /452
中蒙考古合作项目 10 周年考古发现与收获	陈永志 /466



一般与个别：略谈中外历史的会通

阎步克



中国传统史学把自己的使命，概括为纵向的“通古今之变”，至于与四边蛮夷的横向比较，只是“礼乐之邦”的陪衬而已。近代以来的“中外历史的会通”，显然就是一场视角的变革了。把中外同时纳入视野，激发了近代史家的无数灵感。“中外历史的会通”之意义重大，首先在于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建构了事物。进而现代科技极大地增加了各地域的交流频度，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时，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我个人所学习的中国制度史，当然也是如此。

我觉得，根据自然法则，人类生活的“一体化”最终不可避免，其多样性也将以新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漫长曲折的“一体化”中，既存的各民族、地域和文化单元，也在全力维护其独特性。除了争取利益最大化之外，也在于多样性本身的文化价值。学术上也是如此。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便含有一个意图：不是寻求抹杀个性的“规律”，而是采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摒弃一般，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在文化之中，蕴含着人类精神创造的那些最精微的东西，这就需要“内部眼界”。比如说，使用“清新”“华腴”或“沉郁顿挫”之类传统术语，方能传达中国诗词的美妙之处。然而这套术语，或说这种“内部眼界”，无法用于外文诗歌。笔者所学习的政治制度就不同了。



若转入制度领域，那么连“寻求个别”的吉尔兹，也看到了“在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的政治核心中，总有统治精英以及一套符号形式去表达他们真正管理统治的操作行为”，“在任何地方，这一点都十分明晰，国王们通过仪式获得对他们的王国的象征性的拥有”^①。统治精英、符号形式、操作行为、礼制仪式之类概念，实际就组成了一个普适的参照系，可以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

历史学特别关注那些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东西。“天底下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然而千姿百态的纷纷树叶，也是可以类型化的。当你把视线从某一特定个体移开，着眼于更多个体时，“类型”就浮现了。凯特莱说：“人数越多，个人的意愿就会深埋在普遍事实的系列之下，而普遍事实则取决于决定社会存在与延续的总体原因。”穆勒也看到：“本性看来似乎最为变幻莫测的事件，单独处理时看不出端倪，一旦涉及足够多的回数，它们就能够以接近数学规律的特征发生。”^②样本越多，“大数定律”的意义越大。比如说，个人最终无法超越“正态分布”。所谓“中外历史的会通”，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就开始重要起来了。

一位世界史教授曾对我谈到，他讲授东南亚各国史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如何把它们的历史，同中国史“放在同一平台上加以观察”。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尽管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对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情有独钟，但它毕竟还有一个科学层面。科学要求对同类事物采用同一方法，不能甲人、甲地、甲事物是一套，乙人、乙地、乙事物又是一套。有人认为，中西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不同，本质上是不可比的。然而也可以换一种态度：人类既然是同一个物种，其各个种群的结构就应该可比；其各种差异，可以、也需要在同一平台上呈现出来。中国有很多传统政治术语，如“德治”“法治”或“王道”“霸道”之类，它们无法用作比较各种

①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导读”14—15页，正文162—16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② 转引自[英]鲍尔：《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48、5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权力结构、政治思想的共同平台，只是分析对象而已。适当建构起来的“同一平台”，看上去是“中外历史会通”的基本问题之一。

有一种观点，说是“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广泛存在着各种“自治”。对此秦晖做出了一个出色反驳。他通过比较西欧、东欧、东亚、南亚、西亚等地的“小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有力阐明了在各前现代文明中，中国属于“大共同体本位社会”^①。这就是一个基于“会通”的认识。假如谁想反驳它，那就必须遵循同样方法，即引证其他社会的相关资料提供比较。最近我参与讨论“中国专制主义”概念的问题，这时就深感中国传统政体的认识也依赖于“会通”，即需要在政体类型学的层面建立共同的参照系，对人类史上的各种政权分类比较，由此在“序列”中确定中国皇权的属性，而不宜孤零零地就中国论中国^②。

这样的理论框架的建构，经常要超出历史学领域，而进入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从学理上说，一套解释模式，在自身所处的层次不可能拥有“完备性”，必须求助于更高层次的概念体系。中外政治制度史的“会通”，须以一般政治学理论为基础；中外经济史的“会通”，须以一般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假如要比较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地方行政，只把二者放在一起各做叙述，还不算“会通”；假如要比较西方的“四要素说”（土、水、火、气）及其医学理论与中国的“五行说”及其医学理论，只把二者放在一起各做叙述，也不算真正“会通”。这时的分析平台，要在更高的行政学，或文化学、医学层次上建构起来的；换个说法，则是历史学与行政学、文化学、医学的交界面上建构起来的。个人当然可以不承担这种建构，大多数人只是利用既定范式、从事具体研究而已，可对一个领域就不是如此了。超越实证、也超越“地方性”的新平台的探索与搭建，是“中外历史会通”新开拓的基础工作。

① 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见《传统十论：本土文化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61页以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12(6)。



近代中国人最初看世界时，采用的仍是“内部眼界”：用“大同”来比拟民主，用“议郎”比拟议员，赞扬华盛顿的“推举”，“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等等。随后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就不相同了。他们尝试把中外比较，建立在一个共同平台之上。严复翻译孟德斯鸠《法意》之余，对中西政制之异颇有评述，其若干认知已积淀下来了。像“家长主义”问题上的中西之异，严复的讨论至今仍有价值。康有为曾“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在万木草堂开设过“外国政治沿革得失”的课程，为光绪编写过《列国政要比较表》。其《官制议》一书中有大量中西制度比较，不乏卓见。萧公权评价《官制议》：“可说是当时中国讨论政府官制的论著中，最有系统的一部。”^①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以现代政体理论为“平台”，采用了专制、贵族制、封建制等概念，本于中国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为历代政治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并阐述了中央集权、外戚势力、异族政权和部落贵族、宰相权臣等重大问题。其基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历史分期，不妨说是中国学者的“制度史观”的开山之作。我想这篇名作，可以列为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之文。这类比较，都在为“中外历史的会通”搭建平台。

时至今日，中外比较业已蔚为大观。相关的论著、论文，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并不过分。大到中外历史的不同方向和阶段，小到风俗、器物，旁及环境、自然……。尽管各位具体研究者可能仅仅在各个“点”上深挖，但从整体上说，视野开阔的中外比较，必将使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视角、方法、课题得到深化，并引发新视角、新方法、新课题。

二

从理论上说，“中外历史的会通”的基础是一个共同框架。然而在科学实践中，每个人的具体分析方法，又必定是家异其说，且因时而异的。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的历史分期，以政治体制、政治

^①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19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形态为本，可以说是“制度史观”的。而近代以来，文化史观、经济史观等，也开始展示风采。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由此令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它们都是清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①，均令人耳目一新，学术创新度相当之大。“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了。

用现代眼光审视中国史，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了一步。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用古代、中世、近世为中国史分期。“上古”或“古代”到东汉中期为止，这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时期。在经历了汉晋间的过渡后，进入六朝隋唐之“中世”，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被认为是贵族政治。唐宋之际又发生了“变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型^②，其意义是“东洋的近世”，中国由此步入近代社会。

这个“三分法”，很大程度上是比照西欧史而来的。近代日人受西欧史启发，把日本史分为“上古之史”“中古之史”“近代之史”，进而又“西体中用”，把这个“三段论”用于中国史^③。有人说，这个中国史的“三段论”与西欧史只是“形似”，实际上所遵循的，仍是中国史的内在规律。然而无法否认，在理论起点上，“三分法”来自对西欧史三阶段的模拟参照。宫崎市定是这样提问的：“欧洲史上三个时代（按即古代、中世、近世）的概念，大致如上所述，这个时代观念怎样适用于其他地域？”于是，汉帝国可以媲美于罗马帝国，北方民族势力“亦可与日耳曼雇佣兵相比”；“东洋的近世亦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一起开始”，这时候的资本主义、君主独裁、国民主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载《红旗》，1972（7）。

② 正如柳立言先生所论：只有认为唐宋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而且这个转型具有“近代化”的意义，才是日本京都学派“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其：《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1）；《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一般性地申说唐宋间的变化，认为此时进入了历史中期或后期，那跟日人的“唐宋变革论”并不相同。

③ 参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载《北京大学学报》，2014（1）。



义、宋学等，看上去可以比之西欧近世。宫崎市定进而这样申言：“既然我们的态度是将特殊的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则所谓特殊事物实际上便不再特殊。”^①这个辩白确实很思辨、很机智，然而也足以证明，宫崎并非不知道他的“比之”是一种套用。他只是表明，自己就要寻求一个“深刻的片面”。为“唐宋变革论”提供的各种论证，大抵都是参照了西欧近代化的。

与之类似，尽管中国学者努力阐述，“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的特点，但在理论起点上，这类认识仍是以“五种生产方式”为本的，可是“生产方式”只有五种吗？任何社会都必然经历“五种生产方式”吗？中国学人对“封建”概念已提出了各种质疑。那么在“会通”的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扭曲变形，若直接以一方为模板来剪裁另一方的话。

当然，学术的推进其实是很奇妙的，它也经常通过“深刻的片面”^②来获取新知。只有上帝才是“全面”，然而上帝并不存在。应该承认，中国的“五种生产方式”、日人的“三段论”依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各种不同论点，宛若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同时必定各有所见不及之处，“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

“五种生产方式”是一种经济史观，日本的京都学派的“三段论”则被说成是“文化史观”（这个“文化”是“大文化”，不限于思想文化）。日人相信，内藤的“文化史观”揭示了中国史的内在特质。然而在这个模式之中，秦奠定了两千年帝国制度的重大意义，以及两千年帝制的连续性，仍有被低估之嫌。唐宋间的历史趋势，是沿中国史自身的逻辑与道路继续前行呢，还是转身走上了世界另一局部地区的近代化道路呢？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对于中古士族通常要冠以“地主”二字，故对此期士族是“寄生官僚”还是“自律贵族”的讨论，无疑是日人居优。范文澜断言，三千年的一大堆历史

①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② 我是最早从黄子平先生那里，听到“深刻的片面”这个提法的。参见其：《深刻的片面》，见《深思的老树的精灵》，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现象，本质上“却只有一个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所有权问题”，一旦土地改革胜利，“即全中国永远大治的时候。”^①然而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近几十年“制度史观”又有逐渐复兴之势。首先，“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政治反思，促成了历史学者对“政治体制”的再度重视。进而，进入 21 世纪后的“中国崛起”和经济成就，又出现了很多新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总结改革成就，几乎异口同声把“行政主导”视为最大的“中国特色”。GDP(国内生产总值)体量不久将居于世界第一，在政治体制上又与西方国家保持了重大区别。现行政治体制应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维持，或者在什么方向上加以改革？各种不同的主张与论辩，表明它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这甚至成了一个世界性论题——中国很重要，当中国“统治世界”会发生什么？^②而中国人已在讨论改变世界规则这样的问题了。^③就连“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者，也不由得滋生了犹疑，承认了中国的未来“尚无答案”——“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呢？”^④

比之 20 世纪之初，在 21 世纪之初，史学家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自秦汉就发展出了现代式的集权官僚体制^⑤，两千年连续不断的政治传统展示

① 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08、11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② [美]安德森：《中国预言：2020 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葛雪蕾、洪漫、李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美]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③ 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④ 弗朗西斯·福山在 20 世纪末期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其中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讨论颇不充分。而在他 2011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译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便有了很多讨论。而且承认，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两点尚无答案：一是中国的未来，二是若干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治衰败迹象。

⑤ 顾立雅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曾评价说，早在纪元之初，中国就显示了与 20 世纪的超级国家的众多类似性。H. G. 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I, 1964.



了巨大历史惯性，影响至今，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并将继续展示各种影响，尽管物质生产与生活比古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反过来启迪学者重新审视国史，正视这一事实：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古今的社会形态上，都是一个巨大权重。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决定着经济、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①有人称之为“轴心制度”，有人视之为众多分支领域的“统摄核心”。据报道，201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20多位中国史学家取得了如下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②类似看法还可以举出很多。而几十年前有学者就已提出：“中国现在所遭遇的问题，政治仍是最紧要的。”“这一传统笼罩到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所以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质，首先必须研究这个政治的传统。”“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现代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③

社会科学方面，对“制度”的重视与日俱增。经济学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出现了“新制度主义”。这对中国史研究的“制度史观”，看上去也是一个好消息。一百年前梁启超率先阐释的“制度史观”，已尝试在共同比较平台上阐述中国史了；加之一百年来中国制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为各种“会通”的努力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在这个“制度史观”中，夏商周早期国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1.0版，秦以来两千年帝制是它的2.0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3.0版，正在探索形成之中。

与日人的“三段论”不同，“百代多行秦政法”的意义应予充分强调。与“封建社会”观点不同，两千年的中国是农业官僚社会。说到魏晋南北朝，则一百年前梁启超有论：“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一百年后田余庆有论：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在“变态一回归”的视角中，此期

①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2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② 《〈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载《文史哲》，2010(4)。

③ 余英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139页、146—1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的政治体制源于皇权官僚政治，最终依然“回归”于皇权官僚政治了。魏晋南北朝若非贵族政治，那么唐宋的政治变化，也就没有构成根本性的政治转型。至于近代政治变迁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在外力冲击和推动之下，其固有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又一次“升级换代”。我们刻意使用“升级换代”一词，就是在外源性的推动之外，强调它也是同一事物连续发展义，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含有中国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与节奏。

三

现代学术曾给中国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又不能忽略这样一点：所谓“现代学术”的具体内容，是主要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方法，但因为没有把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完全纳入考虑，那些认识是否充分“普适”，并不是没有疑问的。这还不是所谓“东方主义”那一类问题，更多的是“地方性”的问题。比如，用于分析西方人心理的模式与技术，很可能不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西方经济学，难以充分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起飞。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其实仍没有摆脱“地方性”。古希腊的政体理论，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也只是一个不甚清晰的轮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者开始了对各种政体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比较，动辄对数十数百个国家政权加以分类，但传统中国的资料不能说已被充分利用了。

在讨论国家起源理论时，张光直曾指出“(美国)考古学界在将社会进化学说应用在世界各区古代文化史时，集中其注意力于所谓‘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在这些讨论中间，很少人用到中国的材料，因为中国古史材料还很少用最近的比较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去处理”，那么中国的商周史料，“在社会进化论上与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可能有什么新的贡献？”面对商周国家的独特性，一种方式是把中国视为常规的变态，而“另一种方式是在给国家下定义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考虑为分类基础的一部分，亦即把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作重新的安排”。总之，张光直认为，“中国考古